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



一、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

-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



1、早期渊源—晚明时期的进步文学观

- 明中叶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李贽，曾率先高举起个性解放的旗帜，以“童心”说，“自然”说等文学主张，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哲学观、伦理观，以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观，向“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的封建文学观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 所谓童心说，童心即是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他认为，具有童心，才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文字，“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 所谓自然说，就是因为注重作品的真情实感，所以他反对在形式上过于雕琢，而要求以自然朴素为美。

- 童心是内容方面的真，而自然说是形式方面的要求，“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宜畅；性情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性情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就是说，如果没有真性情在其中，只有雕琢的字句和声律，也同样是假文，所以应该在写真性情的基础上出以自然朴素的笔法。
- 他曾十分蔑视被奉为经典的《论语》、《孟子》，极力推崇正统文学之外的小说戏曲，为市民文学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

- 接着出现的“公安派”，特别是代表人物袁中郎（袁宏道），直接师承了李贽的文学观，把人的解放和文学解放的思潮，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可以说开启了晚明包括《牡丹亭》、《金瓶梅》等市民文学的繁荣。（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第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这种与封建正统文学分庭抗礼的人文主义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五四文学先驱。❖

2、 先导—近代进步文学

-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近代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诗人龚自珍，在他的创作中，曾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及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且喊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时代忧愤，抨击了清朝统治下“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大声疾呼改革的“风雷”。

3、前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观

-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即是说片面学习西方物质技术的失败，如以前主张学习人家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船坚炮利”。只有物质文明上的学习是不够的，必须在政体上还有思想上加以更新。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吸取洋务派的教训，主张变法维新，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同时，为了政治变革的需要，他们的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 梁启超曾把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视小说为社会改良和政治变革的先导，于是他提出“新小说”或“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华小说界》1902年第2卷第1期），在其中讲到：
-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
- 他亲自实践，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描绘了他理想中的中国。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倡导语言形式的变革，提倡“平易畅达”的新体散文。

■ 黄遵宪首倡“诗界革命”，在内容上黄遵宪主张诗歌应有鲜明的时代感，诗人应写自己独特的感受：“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与他人。”。（黄遵宪：《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中国历代文选》第4册，第3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在诗歌形式上，黄遵宪主张言文一致，为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就需要变更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明白晓意，务期达意”。他在《杂感》诗中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成为“诗界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口号。



- 维新派人物还积极倡导白话文。1898年裘廷梁在《苏报》发表《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的著名论文，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的主张，并且指出：“愚天下之具，（工具、途径）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

- 在这些进步的白话文主张指导下，长江下游各省形成了一股白话文运动。据统计，当时出版的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潮流势不可挡。

- 另外，戊戌变法前后，还大量译介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学说和文学作品，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对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和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五四文学革命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扇窗户

吉祥如意

吉祥

吉祥

吉祥

吉祥

4、直接发端—新文化运动

-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包括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在内的第三次大的变革，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为改变祖国积贫积弱面貌而奋斗的胆识和力量。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在经济还有政治立场上的软弱性，辛亥革命很快失败了。



■ 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革命道路的思考。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两个根本原因：一是封建君主专制赖以长存的精神文化基础远未被革命铲除；二是革命党人与人民群众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隔膜。陈独秀在一篇文章《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916年1月第1卷第5号，讲到：“吾国年来政象，唯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于是，让民众觉醒的思想革命，被推上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



- 先驱者认为，思想革命可以同时解决辛亥革命暴露出来的两个问题，既能够通过通过对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批判来铲除封建君主政体的精神基础，又能够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启发民众，促进国民意识的现代化。
- 在封建思想体系完备的情况下进行思想革命，先驱者认为最为快捷的途径是引进西方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意识。

■ 为适应思想革命的需要，于是《新青年》杂志应运而生。《新青年》是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综合性期刊，它的原名叫《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攻击，提倡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敬告青年》

吉祥

-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 后来陈独秀又把这六条进一步归结为“拥护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总口号。（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曾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莫克拉西、赛因斯）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

吉祥

- 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开始从政体向思想革命、从政治觉悟向伦理觉悟转移，这标志着一场新的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稍后的文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理论条件和思想基础。

吉祥

吉祥

吉祥

吉祥

吉祥

吉祥如意

■ 二、文学革命的经过 及主要内容

吉祥

吉祥

吉祥

吉祥

吉祥

吉祥

(一)：1917年1月前—酝酿阶段。

- 《新青年》同人在宣传新思潮，开展启蒙运动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创刊后不久，针对国内文坛状况，陈独秀就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进过程，并在与张永言的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陈独秀：《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1915年12月第1卷第4号。）这一主张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赞同。

- 1916年10月，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给陈独秀写信，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要求出发，首先提出“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也就是我们后来总结的：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句。对胡适文学改革的“八事”，陈独秀“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除对“五八二项”提出不同见解，其余六事他都“十分赞同”。以上这些讨论虽然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但可视为文学革命的酝酿阶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88041037130006065>